

上

编

一、“世界史”与亚洲、日本

各国家民族以各自个性化历史生命为生存根基，同时，秉承各自不同的世界史使命而结合为一个普世的世界。……这必然是由此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

——西田几多郎《世界新秩序的原理》^①

如果说我们对英美有值得感谢的地方，那么这就在于他们把我们拖进了这个“世界”中，而且，与原来各自的意图相反，使我们不得不回归到东洋自身的立场上来。这里存在着世界理性的狡狴。

——高坂正显《民族的哲学》

我国于东亚曾经建设起国家来，更于欧洲性的世界获得新的发展。并且，如今又于新的世界史性的世界中不断推进其建设。

——高山岩男《世界史的哲学》

亚洲视角和江户视角

在这次以“1850—2000年世界史中的日本”为题的研讨会^②上，之所以给予我发言的机会，想来是因为我近年来确立起“作为方法的江户”视角，并由此展开了对日本近代史及近代知识的批判性论述。所谓“作为方法的江户”，不用说，是依从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而构成的、旨在历史批判的方法论视角^③。正如“作为方法的亚洲”意味着从亚洲出发，对归结为欧洲近代之胜利的世界史做批判性反观的视角一样，“作为方法的江户”亦是从江户出发，对日本近代史和近代知识构成做批判性反思的视角。更直白地说，“作为方法的江户”乃是从事日本近代史的外部之江户来观察近代日本。发源自江户的批判性视线自然要与以往构成江户像的近代视线发生严重的撞击。正如“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发源自亚洲的视线要与以往构成亚洲像之近代欧洲视线，即东方主义发生严重撞击一样。当观察“1850—2000年”的日本时，把“作为方法的江户”和“作为方法的亚洲”重叠起来，对我来说将构成有效的批判性视角的。

发源自江户的视线亦是差异化的视线。发源自近代的视线追溯与自身有着谱系学的连续性，试图构筑起可谓自我塑造的自身形象。而发源自江户的视线则要描画出与江户相异的近代日本的发端，展示其作为新事物的非连续性的相位。关于本居宣长我做了很多论述^④，其关注的重心在于阐明“我们日本人”“我们的日语”等关于日本自我同一化的主张是怎样作为特殊的话语出现于18世纪的德川社会的。这些成为近代日本正统性话语的本国文化上之同一性和言说同一性的主张，在德川后期社

会中只是一种完全依据不可靠的前提，由极少数论客的“信”所支撑起来的独善性乃至偏颇性的话语^①。而“作为方法的江户”将阐明近代知识及其坚信不移的不可靠的形成过程。我所说的“近代知识考古学”便是凿穿日本近代知识话语成立基础的探索方法^②。也是将亚洲视线重叠于江户视线而构成的思想史探索方法。

这里，我依然试图用将亚洲视线重叠于江户视线的方法来观察日本近代的造始。对日本来说近代是怎么开始的？伴随着近代的发生，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日本其自我表象、历史表象是怎样重新创造出来的？又是怎样变化的呢？

1850 年这一时段

1850—2000 年”这一题目中的 1850 年并非单纯取自表示 150 年时间经过的综合数字的一个年份。1840 年的鸦片战争、1853 年的佩利渡航日本、1859 年的日本开放口岸、1860 年的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及 1863 年的萨英战争（因“生麦事件”导致的日本萨摩藩与英国东洋舰队之间的战争——译者）等等，只要举出上述年表中的事实，就会清楚 1850 年在东亚所具有的意义。185 年象征着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军事实力要求开埠使亚洲卷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人们认为，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体系正是在此时期作为世界性体系得以完成的。也是我在此论述的主题“世界史的哲学”之论客高坂正显讲道：“近代性世界通过英国而在世界范围得到扩大。于是这‘世界’成为一个整体。至少‘世界’开始走向同一个方向^③。如果说，随着这一整体的“世界”之完成，“世界史”之历史性世界也得以成立的话，那么，

1850 年便象征着东亚和日本被组合到这一“世界史”中来的时期。附带说明，所谓非西欧地域的世界史乃是打上了引号的“世界史”。而亚洲的世界史又是自身被组合进来的“世界史”。高坂在前面说道，我们是被“拖进”“世界”中来的。我在此，将与这个非西欧地域被编入到“世界秩序”而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作为“世界史”打上引号来使用。

我关注 1850 年，是因为它与 1868 年这一日本政治史上的时期划分具有不同的意义。1850 年并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分期，而是意味着东亚“世界史”成立的时期划分。因此，与“1850—2000 年”这 150 年的时期划分一起被追问的，是背负着东亚这一地缘政治学上的区域划分的日本，如何被组合到“世界史”中，而不久又是怎样自己积极地参与到这个“世界史”中来的？如果从我的思想史专业角度来谈这个课题，即所追问的是近代日本的“世界史”思想体验之话语上的趋势，也是近代日本关于“世界史”之自我表象的状态。从与这个“世界史”的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将 1850 年至 2000 年的日本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第一个时期当然是始于 1850 年。东亚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通过对“世界史”的历史性体验，日本把自己构筑成近代国家。与“世界史”相关的第二个时期，我认为始于 1930 年。这是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积极主动地进入“世界史”、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的日本，面向世界要求重构“世界史”、重组“世界秩序”的时期。日本是“世界史”的积极参与者、“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的这一时期，我认为一直延续到 1980 年代。因为，从“世界秩序”重要成员的位置来看世界和亚洲的认识图式，即 1930 年代由帝国日本所形成的认识图式，并没有因为 1945 年日本的战败而获得本质上的改变。从战败到 1950 年代的战后日本，

难道不是应变化而未曾去改变的日本吗？从 1930 年到 1980 年的时期，大致相当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暂短的 20 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解体”^⑤的时期。而第三个转折期即 1980 年代，则不单单是日本，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恐怕意味着“世界史”的终结和新的历史^⑥之开始的吧。

组合到“世界史”中去

与东亚一起，日本的近代是以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被编入“世界史”过程而开始的。日本的近代化意味着自愿走向发源于欧洲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日本，或者亚洲的近代，也就意味着这种有着清晰发端的历史过程。如前所述，“作为方法的江户”视角就是要注视将自己与江户差异化的近代日本的发端，观察其非连续性的发生发展。而“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视角，则是从编入欧洲化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的过程来观察日本近代的发端。这样来观察近代的历史性发端，也便是预想其历史性的终结。我认同于这样的提法：即沃勒斯坦所谓作为“历史性秩序”的资本主义^⑦，就是说作为有开始便有终结的历史性构成的资本主义，其社会的、经济的秩序这一提法。我们要了解其何以发生，是因为要知道其终结。正如朱子依据《易》之“原始反终”寻求生之原始而知其死之终了一样，人们观察事物是怎样开始的，可以知道事物是如何终结的。

自愿走向“世界史”也便是将自己编入到欧洲普遍主义的“文明”历史当中。将日本近代化过程做历史性的表象化，即是作为这一普遍主义的“文明”之有资格的接受者，或者作为

这一“文明史”在亚洲所诞生的嫡系弟子而把自己做历史性的表象化。沃勒斯坦说“普遍主义是强者送给弱者的‘礼物’^①。这个“礼物”对正直的接受者是使之接受其屈从，对反抗者来说是使之承担其失败者之不利的双料“礼物”。近代日本是一个以和魂洋才式的策略巧妙接取这一“文明”的强者之赠与的接受者。明治日本将自己的历史同化于这一普遍主义的“文明史”，建立起文明史之自我的历史表征。竹越与三郎的《二千五百年史》^②就是将“新日本”作为这个“文明史”的嫡系弟子，通过日本的历史表象来显示的文明史式历史叙事。

在这个日本的文明史式叙事中，有一个竹越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即怎样从文明史的角度来阐释由中华帝国到日本帝国之近代史上东亚盟主更换的必然性。在此，竹越采用了针对象形文字而强调与之对抗的声音文字的文化表征。他认为，具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汉字这一象形文字所代表的大陆文明，虽然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日本却建立了独自の国民文化，并得以发扬光大，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发明了假名文字，将声音文字作为日用文字来共享。竹越是把这种假名文字的形成作为“背负声音文字之文明的人种之胜利”来叙述的。

代表支那文明的象形文字其势力极其强大，然朝廷虽对此尊崇备至，民间却并不因此而使用象形文字。……虽然象形文字其势力对微弱之日本文明的压力如岩石压卵一般，却不曾压倒，创造出平假名、真假名者，难道不是其满足了国民之需求的证明吗？虽然从一开始也多少使用了一些文字。……象形文字不曾变成国民的语言文字，却有别一种声音文字遍及全

国，观此可以认为日本有其固有的声音文字，同时此乃背负其声音文字之文明的人种之最终胜利。

日本被结合到声音文字之文明的胜利这一当今的“世界史”中来竹越在此阐释的是，腓尼基·印度文明这一古代声音文字文明的潮流早就洗礼了古代日本列岛，其文明的语言上的产物留在了这个列岛上。

竹越的《二千五百年史》是从文明史方面讲述帝国日本重新登场的正统性之叙事。这个正统性大概会因奋发的国民和国民文化的形成而得到证实吧。我们不必去看竹越共鸣于（丰臣）秀吉伟大抱负而对朝鲜战役的详细描述，不必看他德川日本有组织的社会压抑及在“谋求安康之幕府”下日本的贫弱不振的慨叹，也会知道竹越的叙事乃是已然作为东亚盟主而君临于世的“帝国日本的国民史”。他的《二千五百年史》已具备了 1850 年至 1930 年的日本，其自愿编入“世界史”这一近代文明史之历史表象的特征^③。

昭和 Japan 与对“世界史”之再认识

不必举例 1929 年世界经济恐慌的发生、1932 年满洲事变的爆发，以及 1933 年纳粹政权的成立等现代史年表上的事实，也会得知 1930 年意味着世界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历史发端。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本虽说在关于极东的德国权益方面以外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更多注目，但参与世界大战本身意味着日本积极地参加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史”中来，不久便开始要求“世界秩序”的重组了。在参战的同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 21 条要求（1915），它既是日本为把满洲划归于自己的

权益范围予以统治而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也是对东亚国际秩序提出帝国主义式重组的要求。通过这场战争日本确实逐渐成了“国际政治游戏中的主要制衡力量”^④之一。

在昭和时期的日本为确保其在东亚的权益范围，向世界要求“世界秩序”重组的主张中，通过重新认识“世界史”而给出明确的哲学性表述的，是所谓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哲学”或者“世界史的立场”。结集于西田几多郎影响之下的京都学派年轻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推进了有关“世界史”再认识和“世界秩序”重组的哲学性话语化。他们是把“世界史”作为“近代”这一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即“欧洲世界史的阶段”来把握的，并再次对近代日本遇到的“世界史”正是“欧洲世界史”这一状况做了确认。让我们通过“世界史的哲学”之代表性论客高山岩男的理论来追溯一下“欧洲世界史的阶段”之成立过程吧^⑤。

“欧洲世界史”的成立是欧洲膨胀扩张的结果。成立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其发展必然要以欧洲以外的地区为市场，要求这些地区成为资源的供应地，而引起欧洲世界的扩张。于是，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若没有欧洲以外地区的存在，欧洲本身也就无法存在了。这便是“欧洲世界史”的阶段。从文化史上观之，这也是通过近代欧洲文化的传播“非欧洲地域之欧洲文明化”阶段。这样，因非西洋者包含在欧洲近代文明中，故形成了“世界文化”或者“统一的文化世界”。“近代”是世界统一于这个“欧洲中心的世界”之时代。“欧洲近代”这一历史性阶段也就作为“欧洲世界史”而得以成立起来。

高山进一步强调，作为欧洲文化之普世性扩张的“近代”还伴随着欧洲式近代国家原理的普世性扩张。“不久，非欧洲地域的国家也具备了欧洲式的资本主义体制，结果成了与欧洲

的国家对等的近代性国家。”因此，“世界史”的成立亦是欧洲近代国家原理向世界扩张的时代之开始。与“世界史”同时成立的“世界秩序”也必然内在地包含了国家间的对立。进而，高山在这种内涵国家间对立的秩序中，看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性世界不能崩溃解体的原因。

战争与“世界史的哲学”

“世界史的哲学”其立场中对于“欧洲世界史”成立的理解和认识，与我们作为讨论“世界史”之前提的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和“世界史”成立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沃勒斯坦的普遍主义式体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也是内涵着国家间的体系上之矛盾的。的确，只要“世界史的哲学”之立场是一种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局看到了“欧洲近代原理彻底破产”的历史认识，那么，这一认识将与后现代（现代以后）的世界认识没有什么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今我们有必要对成立于1940年日本的“世界史的哲学”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解读。例如，他们针对一元论“欧洲世界史”的支配曾提示出与之对抗的多元论世界。

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世界中，必须承认多种世界史，多种历史性世界的存在。总之，坚持历史性世界的多元化立场，乃是考察真实的世界史所不可或缺的条件。^④

对于“世界史”的再认识和追求其重组的要求，也就是对“近代”进行批判性超越的要求。“世界史的哲学”最初便披上

了超越“欧洲近代”这一世界观的外套。但是，这个“世界史的哲学”从自身立场出发所形成的世界认识和近代批判的话语却成了实施“大东亚战争”的帝国日本之立场的哲学化粉饰，也只能成为这样一种东西。我们观高坂正显、高山岩男等京都学派年轻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关于战时话语的代表性记录《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¹⁷，发现他们似乎通过多次座谈会相互之间印证了这一点。这个鼓动狡辩饶舌、西田遗传的历史哲学式文词的哲学性话语最终印证了下面这一事实，即因其哲学叙述的风格使之只能成为隐蔽的欺骗性叙事。然而，为何“世界史的哲学”话语只能成为帝国日本及其侵略战争的哲学粉饰呢？

如前所述，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对“世界秩序”的积极参与。这场战争的确是一场“世界”战。高山也强调通过这场战争“包括东西两大洋的全世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历史性世界”。同时，“世界史的哲学”论客们又于这场战争中看到了欧洲式近代原理的破绽。因为，这场战争是以构成“世界秩序”的诸列强间“帝国主义争霸”为“根本原因”的。那么，积极参与“世界史”，对真正的“统一的历史性世界”之形成给予了强有力影响的日本，不也是同样因其“根本原因”而承担了“帝国主义争霸”之有力的一翼作用吗？在见出欧洲近代原理之破绽的这场世界战争中，依据欧洲近代的国家原理而强大起来的日本不也是参与了战争，甚至对敌人不在场的中国施行了露骨的帝国主义要求吗？高山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吗？

“世界史的哲学”最终只能成为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哲学粉饰，原因在于这些急于对非欧洲的日本这一地缘政治上的要求做出回应的哲学家们只能将自己的哲学言说作为对抗性言说来构筑。正如对抗性言说总会如此那样，“世界史的哲学”

完全缺乏对于自我本身的认识。“世界史的哲学”是一种把自己作为“世界史”的审判者，在假想之上编织出“世界史”的终结和新的世界史之开始的话语。对于这一话语的详细情况我将在最后加以考察，现在对于身处历史的巨大转折点上的我们来说，为了不容许其反复再生产，需要做的是把看到“世界史”之终结的人们所抱有的假想和认识的错误，以及基于错误而构筑起来的自我正当化的言说和理论彻底地暴露于批判性的视野之中^⑧。

“世界秩序”的主要成员日本

明确地形成于 1930 年代的日本国际地位，是作为“国际政治游戏的主要制衡力量”之一的、面向世界要求其“秩序”重构的地区指导者日本的地位。也是一种面向世界主张扩充其权益范围的帝国主义日本的地位。通过这个扩充权益范围的要求，East Asia 作为“东亚”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得以重新形成，不久随着战争的发展作为不可缺少的补给基地的“南方”（南太平洋地区）被划入日本的新权益范围之中。从 1930 年代开始，日本建立起以自己为盟主而君临之的“东亚”地域概念，又将“南方”也作为自己不可缺少的领域附加于己，最后形成了“大东亚”。

然而，这个形成于 1930 年代，并据此发动了 15 年战争的帝国日本，其有关自己在世界中之位置的认识图式，在经历了 1945 年的战败后真的解体了吗？军事大国日本虽然解体了，但日本在世界中特别是在亚洲的地位之认识图式却得以保留下来并贯穿于战后的过程。难道不是这样吗？日本对战后的处理是以美国为轴心而实行的。这使得日本对以亚洲为战场的这

战争发生了误解。而自己亲手封住了通过根本改善与亚洲的关系而重新建设战后日本的道路勿庸置疑，战后不久出现的冷战格局促使以对美国关系为轴心的日本急于完成战后的处理和复兴不曾很好地解决与亚洲之关系的日本，稍后与德国一起重新回归到美国霸权之下的大战后西方“世界体系”中来。于是，据说是已然有了平等的日美关系之 1960 年以后，日本以非军事化的形式开始回到曾经是“世界体系”中有力成员的位置上。这同时也意味着作为经济强国，使其恢复了在亚洲所占有的地位。

1980 年代末我在北京逗留了数月，当时映入我眼帘的经济强国日本的（在中国）代表者们的形象，仿佛是军事强国日本的代表者们之噩梦般的转生一样。当我看到在友谊宾馆庭园里以低廉工资做工的年迈中国妇女照看着日本商社职员的小孩，那情景和身影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滋味。这难以忍受就在于不自觉而延续下来的日本人那个认识图式。对于 1930 年以后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认识图式，虽然经历了战后却由于没有明确清算意识的日本国家而被暗中维持下来了，难道不是如此吗？与旧殖民地和被侵略国家的亚洲诸国的关系，日本国家除了一点儿一点儿地做出关系修复的表明之外，根本没有表明其对错误的清算和建立新关系的明确国家意志。由于这种关系修复意识的缺乏，从日本权力机构的高层不断发出有关靖国参拜问题，还有历史教科书问题等修正历史的要求。可以说，帝国日本这种具有连续性的要求贯穿整个战后过程而一贯由日本国家保持下来了。“日之丸·君之代”的法制化便是日本国家与那个帝国日本具有连续性的露骨而不知羞耻的认知要求¹⁹。

“世界史”的终结与历史转折

始于 1980 年代而在 1990 年代逐渐明朗化的冷战格局的解体，以及世界各国间秩序的动摇乃至全球化中所见超越经济界限的流动化，昭示了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巨大转折时期。所谓巨大转折也便意味着某种终结和某种开端吧。什么终结了呢？终结了的只能是那个“世界史”。我们只能说，1850 年以来日本自愿与其发生关系并参与其中，成为一个有力成员的“世界秩序”，连同那个“世界史”一起终结了。就是那个“世界史的哲学”论者最早提到其终结的那个“世界史”。

然而，讲某种历史的终结乃至开始，这将是这么一回事呢？此刻现在身处其历史过程中的我们，谈论其终结或者开始，这种话语能够成立吗？谈论终结，如《历史的终结》那位作者那样，不过是在归结为民主主义之胜利的 20 世纪末，陈述和确认了黑格尔阐释者的“历史的终结”话语而已。另外，我们是否应该将某种终结作为新的前进方向之预测来谈论呢？谈论我们应该选择的前进方向的话语并非通过积累下来的各种资料数据而对将来的单纯预测。占卜者的话是不负责任的。有关历史发展道路的表态，应该以发言者对历史所具有的态度为前提，应该是与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方向相关的伦理性行为。如果认识到我们此刻处于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转折当然应该是包括了自己存在于其中的各种体制的解体。透过这种转折得以确定将来的前进方向，为了就此有发表意见的能力，就要以我们对所有过去的反省性认识为前提。对于过去之历史性认识，是要通过“这样不行”等的自我否定性的认识来厘定走向将来的道路，而不是为了再次确认自我的连续性。自我反省

这一理所当然的伦理性态度，是发表有关我们将来前进方向的意见之不可缺少的前提。

我强调，从早已讲到“世界史”的终结和新“世界秩序”构想的“世界史的哲学”吸取反面教训，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我称其为反面教训，因为此乃与“何以只能如此呢？”这一否定性追问一起，是有必要重新回顾的话语。早已讲到“世界史”终结和新世界开始的“世界史的哲学”，为什么只能成为帝国日本侵略主义的哲学性粉饰呢？对于如今面临“世界”终结而面向未来欲有所表态的人来说，这是深刻而不可缺少的反省性追问。

“世界史的哲学”之反面教训

高山这样指出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近代原理所包含的矛盾及其破绽：“自由主义的根本原理，就这样归结为毫无内容的伦理化理想与权力横行的事实无法结合的并存，而失去了导致某种世界永久和平的实质性道义力量。”这里所说的欧洲近代世界所有的理想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乃是欧洲近代文明的普世主义理想与主张自我权益的近代主权国家的特殊存在之间的矛盾。那么，发源于近代欧洲的世界史，也就是我称之为“世界史”的历史阶段，已经是由这种矛盾所构成的东西了，于是，因其矛盾的激化这个历史阶段已然开始走向终结了。高山认为，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写作《世界史的哲学》之 1942 年当时所进行的世界大战，就成了导致“世界史”真正终结的战争吗？不，高山把对英美的战争视为对“确立在欧洲近代原理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抗议”。他说贯穿于这场战争的是力图“打破旧的近代秩序，建设新的

世界秩序”的精神。如今经由实行战争的日本，“世界史的转折”正在发生。

然而，在怎样的意义上，日本的战争行为具有导致“世界史的转折”之行为正当性呢？日本难道不也是追求自我权益的作为近代主权国家而实行战争的吗？被称为“圣战”^①的大东亚战争，难道不是日本针对欧美要求在东亚的帝国主义霸权之确立而实行的战争吗？“世界史的哲学”立场，对于这些追问将以怎样的话语构成来回答呢？大讲“圣战”、“总力战”和“战争之形而上学”^②的这一哲学话语置其正当性的根据于哪里呢？下面，我们根据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哲学》和高坂正显的《民族的哲学》，来提示和整理一下答案。

1. 关于历史性世界中的国家的话语群

“作为历史性国家而维护自我本身，这只能是历史性的世界。国家的所有伦理和权力都存在于这个历史性世界中，被这个历史性世界所规定着。”“在国家之中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抽象性道义，也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审判法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是一个绝对性的存在。”“所谓世界史是世界审判，其意义不在于它是站在国家之上的超越者之审判，而必须是从国家本身的历史命运显示出来的自我审判。”（《世界史的哲学》）

“民族是主体性的，也是实践性的，总之是自我规定性，故具有其权威性。这个民族是形成国家的民族，国家性的民族。”“世界史的民族是解决世界史问题的民族之意。是果敢地实践这个课题的民族。”“在历史性世界里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的只能是国家。”“国家的出现是以战争为媒介的……。战争将民族铸就成国家。”“可以称做战争的东西只有在与绝对权威相关联的地方才存在。主张绝对权威的国家之间要发起战争。